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楚有为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全面实施新审计准则后审计师增加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制度背景,采用2017—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政策性负担对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师越可能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以此降低风险,具体表现为披露数量更多,披露内容更详细。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是政策性负担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两个渠道。在劳动保护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加,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削弱了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与被审单位风险密切相关,审计师的风险应对决策考虑到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政策性负担;新审计准则;关键审计事项;经营风险;代理成本;风险应对决策;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2)04-0032-09

一、引言

2016年财政部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并披露认定原因和审计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审计项目的具体信息,实现了与国际审计准则的持续趋同,2018年后所有A股上市公司均需要执行新审计准则,新审计报告改变了原有“二元制”审计报告所存在的内容简单、形式单一、信息匮乏的局面,可以向投资者透露审计意见背后的风险评估与应对过程。虽然新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应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但并未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做出明确要求,审计师对披露事项的数量和翔实程度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关键审计事项对报告使用者是否具有信息含量^[1-4],以及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感知责任的影响^[5-7]。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很好地体现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一方面根据准则的要求审计师需要沟通风险较高的领域,直接披露审计师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过程;另一方面,审计师可以利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降低投资者对审计人员承担责任的认定,从而降低诉讼风险和处罚风险,这也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手段。

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因素视角看,审计准则规定审计师确定关键审计事项需综合考虑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特别风险、重要审计判断、重大交易对审计的影响等。学者也从公司特征与审计师特征等角度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做出一定探索。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和披露涉及审计师的执业判断,事务所特征和客户特征共同影响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8]。Pinto和Morais发现公司规模、业务分部数量、审计费用和会计准则谨慎性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负相关^[9]。随着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国内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征的研究日渐丰富,研究发现分析师对公司的悲观预期可能导致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语调更消极^[10]。从审计师特征看,与非行业专家审计师

[收稿日期]2021-12-29

[基金项目]南京审计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项目(20QNYPY016)

[作者简介]楚有为(198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邮箱:chuyw@nau.edu.cn。

相比,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文本篇幅更长且更愿意采用结论性评价^[11];当审计师独立性不足时,例如客户对审计师较为重要,或者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存在校友关系,审计师会减少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12-13]。

在地方政府出于维持一定就业水平目的的干预下,当地企业超额雇佣一定数量的员工,是一种常见的政策性负担。研究者认为,为了达到扩大就业、控制地区失业率的目标,地方政府会通过政策干预企业的员工配置^[14]。上市公司不仅是当地的明星企业,还是解决当地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对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可通过干预高管任命,或在高管行政级别晋升或业绩考核中做出引导,影响国有上市公司员工雇佣^[15-16]。非国有企业上市过程中以及后期经营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帮扶^[17],上市后公司很可能会被要求承担解决就业的社会功能,也可能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18]。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效率具有一定负面效应,主要体现为政策性负担提高了企业劳动力成本^[14],增加了代理问题^[19],并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20]和公司价值降低^[21]。政策性负担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会反映在审计师决策上,政策性负担提高了审计收费水平^[2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经济后果,以及审计师披露的内在动因,而较少考虑公司层面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决策的影响;政策性负担领域的文献主要着眼于考察政策性负担对公司自身层面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审计师能否感知并采取相应手段应对政策性负担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将政策性负担的研究思路延伸至审计领域,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全面实施新审计准则,审计师增加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制度背景,以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回归分析和机制检验,考察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几点:(1)本文利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打开审计过程的“黑箱”,直接考察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过程。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审计意见或审计收费等间接指标推断审计师对不同风险的应对,但传统“二元制”审计意见类型无法提供审计师风险应对信息,审计收费除反映对审计风险的应对措施,还反映了风险溢价,因而这两种方式均无法直接揭示审计师对风险的判断和应对过程。相比于其他指标,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特征更能直接体现审计师的风险评估和应对过程。(2)丰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关键审计事项带来的市场反应,较少关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将研究视角切换到审计师执业决策,考察审计师是否根据客户层面的风险而做出不同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决策。(3)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角度拓展政策性负担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主要着眼于考察政策性负担对经营管理绩效的影响,本文则着眼于审计领域,考察审计师如何看待被审单位政策性负担并影响审计决策。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审计风险模型,在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将审计风险控制一定水平的前提下,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呈现反向变动趋势,即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越低,审计师应采取更多、更严格的审计程序。根据上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知,虽然上市公司通过政策性负担可换取地方政府的支持,满足资本市场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期望,对企业发展带来一定助益,但短期来看,政策性负担仍然给公司造成了业绩压力与经营风险^[18],造成较严重的代理问题^[19],增加了管理层财务舞弊的动机和机会。审计师更关注企业短期风险,其责任就是发现当期财务报表是否存在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错报,而政策性负担与重大错报风险密切相关。

政策性负担可通过经营风险与代理成本两个途径影响重大错报风险。从经营风险角度看,《审计准则第1211号》指出,相比于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范围更广且多数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产生财务后果^[23]。以企业冗余雇员为例,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导致额外的劳动力成本^[14],直接降低了盈利能力,并提升了经营风险。另外,由于人力成本上升,上市公司在业绩压力下,可能为满足资本市场的业

绩预期而选择财务造假。因此,政策性负担可以通过经营风险渠道,增加重大错报风险,从而影响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

从代理成本角度看,地方政府无法直接解决就业问题,会通过干预企业雇佣更多员工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作为交换,地方政府会通过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等方式对政策性负担予以补偿^[15,24]。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东无法区分公司业绩降低是由承担政策性负担还是由管理层未尽勤勉义务所致,增加了股东监督和激励高管的难度,为管理层经营不善提供了借口,从而增加了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19]。代理成本是影响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的重要因素,较高的代理成本增加了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可见,政策性负担可从代理成本渠道增加重大错报风险,从而影响审计师风险评估与应对过程。

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很好地体现审计师风险评估与应对过程。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确定的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对关键审计事项的选择与披露是一个执业决策。一方面,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审计师需要根据准则的规定披露更多高风险事项,并且有义务披露对相应风险的评估与应对过程,相比于审计报告的其他信息,关键审计事项更详细地披露了风险评估与应对过程。另一方面,审计师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诉讼风险和处罚风险,现有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减轻投资者对审计人员承担责任的认定^[25],审计师有动机利用关键审计事项减免责任,降低诉讼与处罚风险。这使得关键审计事项成为审计师降低执业风险的手段,项目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审计师减免责任的动机越强,越可能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被审单位的政策性负担很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为应对风险,审计师会更多、更详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首先,政策性负担往往伴随着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导致审计师需要与审计报告使用者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增加。审计师在确定关键审计事项时需关注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政策性负担一方面增加了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师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导致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审计师还需说明该事项被认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以及审计师对该事项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为控制检查风险,审计师可能会扩大审计范围,执行更多实质性程序,例如函证、监盘,并更多地向外外部专家寻求专业意见,从而增加对应对措施的描述。其次,关键审计事项可被审计师用作免责手段,以此应对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执业风险。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存在一定免责效应,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以减轻投资者对审计人员承担责任的认定^[25]。为了应对政策性负担所引发的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师可能会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和详细程度,详尽披露风险应对过程,表明自身已经按照准则要求执行了必要的程序,如果发生与关键审计事项有关的审计失败,比较全面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帮助审计师减免责任^[6],降低诉讼和处罚风险。

总结起来,政策性负担增加了审计师需要关注的风险事项和应对程序,相应增加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出于免责动机,审计师也会更多、更详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披露内容越详细。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政策性负担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主要是由于政策性负担降低了经营业绩,增加了经营风险,经营风险造成财务后果就会引发重大错报风险。政策性负担还加剧了代理问题,使得治理层难以考核管理业绩,难以有效监督和防范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引发重大错报风险。即政策性负担增加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进而增加了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为规避高风险,审计师也可能通过增加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来降低自身责任。因此,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可能是政策性负担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两个作用机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政策性负担通过提高被审单位经营风险,增加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假设3:政策性负担通过提高被审单位代理成本,增加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

本文基于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全面实施新审计准则这一制度背景,以 2017—2020 年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 ST、*ST 以及数据缺失较多的公司样本,获得样本 8963 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和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关键审计事项数据经手工整理。为了消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二) 研究模型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1)验证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审计事项($Kamnum/Kamlength/Solength$),衡量指标为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Kamnum$),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的长度($Kamlength$),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方法文本的长度($Solength$)。关键审计事项个数和文本长度衡量了审计师对企业的风险识别和应对程序,重大错报风险越高,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披露的风险信息与应对程序越详细。解释变量为政策性负担,参考现有文献^[15],本文利用企业超额雇员程度($EXEMP$)衡量政策性负担,相比于纳税或慈善捐赠等其他指标,超额雇员水平可以更好地衡量政策性负担水平,也是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的度量指标。企业纳税需严格遵循税法,纳税水平有较明确的依据,而慈善捐赠属于偶发性支出,无法稳定度量政策性负担。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就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就业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也是干预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重要途径,企业就业人数有较大的变动空间。据此,参考廖冠民和沈红波的研究^[15],利用企业雇员水平与营业收入的关联关系,采用如下模型计算政策性负担,其中 $EXEMP_{i,t}$ 表示企业超额雇员水平, $EMP_{i,t}$ 为企业员工人数, $Sale_{i,t}$ 为企业营业收入, $EMP_{ind,t}$ 为企业所处行业当年平均员工人数, $Sale_{ind,t}$ 为企业所处行业当年平均营业收入。

$$Kamnum/Kamlength_{i,t} = \alpha_0 + \alpha_1 EXEMP_{i,t} + \alpha_2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EXEMP_{i,t} = (EMP_{i,t} - Sale_{i,t} \times EMP_{ind,t}/Sale_{ind,t})/EMP_{i,t} \quad (2)$$

根据现有研究^[15,21],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公司特征选择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应收账款比例(REC)、存货比例($INVR$)、经营性现金流(OCF)、净资产收益率(ROE)、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和产权性质(SOE)衡量。审计特征选择事务所规模($BIG4$)和审计意见(MAO)衡量。另外,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干预的影响,引入所在省人均 GDP(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Wage$)和地区失业率($UNEMP$)三个地区层面的变量。详细变量定义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Kamnum$ 的最大值为 6,最小值为 1,说明上市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用超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Kamnum$	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	
	$Kamlength$	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所有文本字符数的对数	
	$Solength$	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方法的所有文本字符数的对数	
解释变量	$EXEMP$	政策性负担,模型(2)计算得出	
	$SIZE$	公司规模,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LEV	总负债/总资产	
	REC	当期应收账款净额均值/营业收入	
	INR	存货比例,当期存货净额均值/总资产	
	OCF	当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	
	ROE	盈利能力,净利润/年末净资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控制变量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BOARD$	董事会规模,董事人数
SOE		产权性质,国有控股企业取 1,否则为 0	
$BIG4$		当审计师为“国际四大”时取 1,否则为 0	
MAO		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 1,否则为 0	
GDP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人均 GDP(万元)	
	$Wage$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万元)	
	$UNEMP$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失业率(%)	

额雇员程度衡量的政策性负担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EX-EMP* 的最小值为 -6.465, 最大值为 0.889^①。

(二) 回归分析

1. 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回归分析

表3为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回归分析结果。表中的列(1)至列(3)分别以关键审计事项个数(*Kamnum*)、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文本长度(*Kamlength*)和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应对的文本长度(*Solength*)为被解释变量。关键审计事项个数(*Kamnum*)是离散型变量,采用Poisson回归,列(1)中政策性负担(*EXEMP*)的回归系数为0.013,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政策性负担越严重,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文本长度(*Kamlength*)和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应对的文本长度(*Solength*)为连续变量,列(2)和列(3)采用OLS回归,列(2)政策性负担(*EXEMP*)的回归系数为0.024,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政策性负担越严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描述越多。列(3)政策性负担(*EXEMP*)的回归系数为0.009,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企业政策性负担越严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措施的描述越多。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1。

2. 内生性检验

审计师行为影响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可能性较低,即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较少受到反向因果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遗漏变量导致,例如外部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干预,导致企业增加了员工雇佣,同时提高了相应风险,即上文研究结果仍然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缓解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选择企业所在地区当年失业率(*UNEMP*)作为工具变量。企业所在地的失业率越高,企业受到政府干预承担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20],但地区失业率并不直接影响企业审计风险。经检验,三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169、0.117和0.074,说明模型设定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也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4,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政策性负担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后,假设1依然成立。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考曾庆生和陈信元的研究^[14]建立如下模型(3),重新计算政策性负担水平。其中*Emp*为每百万营业收入的员工人数,模型中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ROA*)和资产结构(*PPE*),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计算上市公司超额雇员水平(*EXEMP1*)。改变政策性负担的度量方式后,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表中政策性负担与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Kamnum*)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文本长度(*Kamlength*)显著正相关,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Kamnum</i>	8963	2.091	0.671	1.000	2.000	6.000
<i>Kamlength</i>	8963	6.797	0.496	5.342	6.846	7.851
<i>Solength</i>	8963	7.100	0.433	5.826	7.128	8.012
<i>EXEMP</i>	8963	-0.010	1.120	-6.465	0.341	0.889

表3 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1)	(2)	(3)
	<i>Kamnum</i>	<i>Kamlength</i>	<i>Solength</i>
<i>EXEMP</i>	0.013 *** (4.23)	0.024 *** (3.08)	0.009 ** (1.98)
Controls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Adj. R ² (Pseudo R ²)	0.006	0.078	0.06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列(1)括号中为 z 值,列(2)(3)为经公司层面 cluster 调整的 t 值,下同。

表4 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1)	(2)	(3)
	<i>Kamnum</i>	<i>Kamlength</i>	<i>Solength</i>
<i>EXEMP</i>	0.130 * (1.72)	0.110 ** (1.97)	0.127 ** (2.54)
Controls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显著,列括号中为 z 值。

①限于篇幅正文中未报告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结果留存备案。

但以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方法文本的长度 (*Solength*)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政策性负担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综合表 3 和表 4 的结果,与 *Kamnum* 和 *Kamlength* 两个变量相比,以 *Solength*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政策性负担的系数均更小,且显著性更低,这可能说明审计应对段中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以上结果说明,在变更了度量方式后,政策性负担能够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结论仍然稳健。

$$EMP_{i,t} = \beta_0 + \beta_1 SIZE_{i,t} + \beta_2 LEV_{i,t} + \beta_3 GROWTH_{i,t} + \beta_4 ROA_{i,t} + \beta_5 PPE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三) 作用机理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 2 和假设 3,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两个作用机制。参考李建军和韩珣的研究^[26],本文采用 Atman 提出的 Z 指数作为经营风险的代理变量,该指数越小经营风险越高。参考叶康涛和刘行的研究^[27],采用管理费用率 (*EXPENSE*, 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和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营业收入 / 总资产) 衡量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 (*EXPENSE*) 越高,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越低,代理成本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的实证结果见表 6,检验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文本长度 (*Kamlength*)。以经营风险 (*Zscore*) 为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列(1)、列(2),政策性负担 (*EXEMP*) 与 *Zscore* 显著负相关,即政策性负担增加了经营风险,在控制了经营风险后,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显著正相关,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3.380,对应 P 值小于 0.01,表明政策性负担至少部分通过经营风险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以管理费用率 (*EXPENSE*) 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列(3)、列(4),政策性负担 (*EXEMP*) 与管理费用率 (*EXPENSE*) 显著正相关,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4.399,对应 P 值小于 0.001;以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列(5)、列(6),政策性负担 (*EXEMP*) 与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显著负相关,Sobel 检验 Z 统计量为 4.526,对应 P 值小于 0.001。以上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部分通过增加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综合上述结果,本文发现政策性负担通过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两个途径作用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假设 2 和假设 3 都得到了支持。

表 6 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中介变量	<i>Zscore</i>		<i>EXPENSE</i>		<i>TURNOVER</i>	
被解释变量	<i>Zscore</i>	<i>Kamlength</i>	<i>EXPENSE</i>	<i>Kamlength</i>	<i>TURNOVER</i>	<i>Kamlength</i>
<i>EXEMP</i>	-0.320 *** (-10.28)	0.022 *** (4.35)	0.021 *** (31.34)	0.016 *** (3.12)	-0.148 *** (-44.97)	0.013 ** (2.35)
<i>Mediator</i>		-0.006 *** (-3.58)		0.339 *** (4.44)		-0.072 *** (-4.55)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8963	8963	8963
Adj. R ²	0.508	0.079	0.384	0.080	0.386	0.080
Sobel Z	3.380 ***		4.399 ***		4.526 ***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劳动保护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分析,政策性负担降低短期业绩,增加经营风险,进而增加重大错报风险,并导致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增加。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性负担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影响经营业

绩。若企业单位用工成本更高,则雇员负担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用工成本的高低可以影响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关系。劳动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例如我国 2004 年颁布并实施《最低工资规定》,地方政府限定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单位用工成本较高,超额雇员所造成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业绩表现更差,经营风险更高,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也会增强。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劳动保护的重视程度,劳动保护制度越完善,企业雇佣行为受到的限制越多,企业调整员工数量的成本也越高。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劳动保护水平与政策性负担的交乘项($MWS \times EXEMP$), MWS 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劳动保护水平,当所在地最低工资水平大于当年全国中位数时取 1,否则取 0。回归结果见表 7,交乘项($MWS \times EXEMP$)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劳动保护对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保护较强时,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二) 制度环境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会受到地区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的约束。根据“深口袋”理论,在制度环境完善、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者保护和法律惩戒制度健全的地区,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和处罚风险较高,审计师会更加审慎地应对审计风险。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地区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在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法律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完善,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和处罚风险较高,当政策性负担造成风险时,审计师更可能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达到减免诉讼和处罚风险的目的。为了检验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选择市场化程度衡量制度环境,根据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28],本文采取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制度环境(MKT ,该值越大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①。在模型(1)中引入市场化指数与政策性负担的交乘项($MKT \times EXEMP$)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8。市场化指数与政策性负担的交乘项

($MKT \times EXEMP$)均显著为正,说明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投资者保护和法律惩戒制度越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越可能详尽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三) 内部控制的影响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在制定计划时应首先了解客户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影响审计决策的重要因素。不健全的内部控制增加了审计风险,为了应对,执业风险审计师需要扩大工作范围,提高审计投入和工作时长,造成审计延迟增加和审计费用的提高^[29-30]。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也是审计师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及时发现和纠正重大错报,降低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风险。为了验证内部控制的影响,本文选择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内部控制指数度

表 7 劳动保护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i>Kamnum</i>	<i>Kamlength</i>	<i>Solength</i>
$MWS \times EXEMP$	0.013 * (1.94)	0.022 ** (2.01)	0.016 * (1.70)
$EXEMP$	0.010 *** (3.01)	0.019 ** (2.32)	0.006 (1.18)
MWS	0.030 *** (2.87)	0.068 *** (5.23)	0.064 *** (4.4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Adj. R ² (Pseudo R ²)	0.006	0.080	0.071

表 8 制度环境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i>Kamnum</i>	<i>Kamlength</i>	<i>Solength</i>
$MKT \times EXEMP$	0.009 *** (4.88)	0.015 *** (3.46)	0.007 ** (1.99)
$EXEMP$	-0.061 *** (-3.99)	-0.106 *** (-2.74)	-0.055 * (-1.67)
MKT	0.031 *** (9.14)	0.053 *** (6.82)	0.039 *** (5.4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Adj. R ² (Pseudo R ²)	0.006	0.092	0.078

①《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数据截至 2019 年,采用移动加权平均计算 2020 年市场化指数。

量内部控制质量(IC 为内控指数除以100,该值越大表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在模型(1)中引入内部控制指数与政策性负担的交乘项($IC \times EXEMP$),回归结果见表9。除列(3)外,内部控制指数与政策性负担的交乘项($IC \times EXEMP$)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当企业内部控制比较完善时,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即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风险,降低审计报告中需要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表9 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i>Kamnum</i>	<i>Kamlength</i>	<i>Solength</i>
$IC \times EXEMP$	-0.003 [*] (-1.92)	-0.004 ^{**} (-2.13)	-0.001 (-0.36)
$EXEMP$	0.028 ^{***} (3.09)	0.049 ^{***} (3.77)	0.012 (1.08)
IC	-0.014 ^{***} (-5.34)	-0.014 ^{***} (-3.88)	-0.009 ^{***} (-2.9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N	8963	8963	8963
Adj. R ² (Pseudo R ²)	0.006	0.080	0.070

六、结论性评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所背负的政策性负担会导致审计上的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很好地体现审计师风险应对过程,项目风险越高,审计师需要关注和披露的风险事项越多,应对程序越复杂。为降低执业风险,审计师有动机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起到免责效应,降低诉讼风险和处罚风险。本文基于我国实施新审计准则的背景,采用2017—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策性负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越重,审计风险越高,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对关键事项和应对措施的阐述越详细。(2)政策性负担主要通过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两个途径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3)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劳动保护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加,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削弱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启示是:(1)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存在负面效应,增加了重大错报风险,这种风险可以被审计师感知。对于政策性负担,审计师采取了适当的策略加以应对。(2)当客户所在地重视劳动保护时,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成本和风险也更高,此时审计师更应该关注政策性负担对审计工作所造成的不利影响。(3)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缓解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风险,因此企业政策性负担越重,越有必要加强内部控制,缓解负面效应。(4)对于风险较高的被审单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更为详尽,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反映了审计师风险应对过程,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有助于增加审计报告信息含量。

随着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关键审计事项为审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了决策有用信息,也为学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素材。关键审计事项文本信息十分丰富,针对不同公司,审计师所披露的内容是不同的。本文也试图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视角,考察政策性负担对审计师信息披露异质性的影响,但遗憾未获得显著的实证结果。未来研究中,学者可对文本信息进行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 [1] Reid L C, Carcello J V, Li C, et al. Impact of auditor and audit committee report changes on audit quality and cos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R]. Working Paper, 2015.
- [2] Lennox C S, Schmidt J J, Thompson A. Are expanded audit reports informative to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U. K. [R]. Working Paper, 2015.
- [3] 王艳艳,许锐,王成龙,等. 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 [J]. 会计研究,2018(6):86-93.
- [4] 王木之,李丹. 新审计报告和股价同步性[J]. 会计研究,2019(1):86-92.
- [5] Prasad P, Chand P.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auditor's report: Implications for suppliers and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17, 27(4):348-367.
- [6] Brasel K, Doxey M M, Grenier J H, et al.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5):1345-1362.
- [7] 鄢翔,张人方,黄俊. 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溢出效应研究[J]. *审计研究*, 2018(6):73-80.
- [8] Sierra-García L, Gambetta N, García-Benau M A,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magnitude of entity-level risk and account-level risk key audit matter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19, 51(3):227-240.
- [9] Pinto I, Morais A. What matters in disclosures of key audit matters: Evidence from Europ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19, 30(2):145-162.
- [10] 廖义刚,杨雨馨. 审计师能识别分析师预测传递的风险信号吗——基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文本分析[J]. *当代财经*, 2021(1):137-148.
- [11] 陈丽红,易冰心,殷旻昊,等. 行业专家审计师会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J]. *会计研究*, 2021(2):164-175.
- [12] 胡志颖,胡国强. 校友关系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4):37-48.
- [13] 付强,廖益兴. 审计独立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客户重要性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1):53-68.
- [14] 曾庆生,陈信元. 国家控股、超额雇员与劳动力成本[J]. *经济研究*. 2006(5):74-86.
- [15] 廖冠民,沈红波.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6):96-108.
- [16]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 *管理世界*, 2013(5):100-115.
- [17] 鄢波,王华,杜勇. 地方上市公司数量、产权影响与政府的扶持之手[J]. *经济管理*, 2014(7):164-175.
- [18] 梁莱歆,冯延超.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0):127-137.
- [19] 张敏,王成方,刘慧龙. 冗员负担与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J]. *金融研究*, 2013(5):140-151.
- [20] 薛云奎,白云霞. 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J]. *管理世界*. 2008(10):96-105.
- [21] 杨德明,赵璨. 超额雇员、媒体曝光率与公司价值——基于《劳动合同法》视角的研究[J]. *会计研究*. 2016(4):49-54.
- [22] 楚有为.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基于企业冗员的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5):10-17.
- [23] 蔡利,毕铭悦,蔡春. 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师认知[J]. *会计研究*, 2015(11):83-89.
- [24] 曹书军,刘星,傅蕴英. 劳动雇佣与公司税负:就业鼓励抑或预算软约束[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5):139-149.
- [25] 张继勋,贺超,韩冬梅. 标准审计报告改进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人员责任——一项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5(3):56-63.
- [26] 李建军,韩珣.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营风险[J]. *经济研究*, 2019(8):21-35.
- [27] 叶康涛,刘行. 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J]. *金融研究*, 2014(9):158-176.
- [28] 王小鲁,胡李鹏,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29] 李瑛玫,楚有为,杨忠海. 内部控制、中期审计与年报审计延迟[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2):52-60.
- [30] 盖地,盛常艳.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3):21-27.

[责任编辑:黄燕]

Policy Burdens and Auditors' Risk Response

——Research Based on Key Audit Matters

CHU Youwei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at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ully implement the new auditing standards and auditors increase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cy burden on auditors' risk response decisions by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7 to 2020.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olicy burden, the more likely it is for auditors to reduce audit risk through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which means more key audit items in the audit report and the more detailed the disclosure. Operational risk and agency costs are two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olicy burdens affect key audit matters. In areas with stronger labor protection and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cy burdens and key audit matters has increased. While good internal controls reduc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cy burdens and key audit matt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licy burde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ent risk, and the auditors' risk response decisi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licy burden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Key Words: policy burden; new auditing standard; key audit matter; operational risk; agency cost; risk response decision; internal control